
一幅新近发现的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图

钱 江

〔摘要〕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 (Bodleian Library) 近来发现了一幅被人们忽略了长达 350 余年之久的、绘制于中国明朝中叶的彩色航海地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幅手工绘制的彩色航海图, 而且或许是一幅出自明朝福建海商之手的地图。这幅航海图来自于英国一位著名的律师约翰·雪尔登 (John Selden, 1584-1654) 的私人收藏, 并于 1659 年捐献给了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该图相当大, 大约长 1.5 米, 宽 1 米。该图绘制的地域北起西伯利亚, 南至今印尼爪哇岛和马鲁古群岛 (香料群岛), 东达北部的日本列岛和南部的菲律宾群岛, 西抵缅甸和南印度。航海图上清楚地绘制出了明朝中叶中国帆船经常使用的 6 条东洋航路和 12 条西洋航路, 对研究明清时期中国帆船的海外贸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明代航海图 鲍德林图书馆 闽南商人 东西洋航路

A mid Ming watercolour navigation map that has been overlooked for more than 350 years has recently been discovered at Bodleian Library of Oxford University in UK. It is the first extant watercolour navigation map in the maritime history of China and very likely it was produced from the hands of Hokkien maritime merchants of Ming dynasty. It is from the private collection of John Selden (1584-1654), a well-known British lawyer, and was donated to the Bodleian Library in 1659. This unofficial map is very large, approximately 1x1.5m. It depicts the vast region from Siberia in the north to Java and Maluku Islands (Spice Islands) in the south, and from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east to Buma and South India in the west. In addition, six East Ocean navigation routes and twelve West Ocean navigation routes are clearly marked on the map. Doubtlessly this map is very important in terms of studying maritime trade of Chinese junks in the period of Ming and Qing.

在海外研究中国古代史和航海史的少数学者中,最近在悄悄地流传着一个惊人的喜讯:世界著名的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近来突然发现了一幅被人们忽略了长达350余年之久的、绘制于中国明朝中叶的彩色航海地图(见插图)。今年年初,笔者辗转获得了这幅明代航海图的电子版本,仔细观察、研读之后,喜出望外,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幅手工绘制的彩色航海图,而且或许是一幅出自明朝福建海商之手的地图,弥足珍贵。兹将该航海图的有关情况简介如下,以飨国内学术界同仁。

一、航海图的由来

这幅明代中期的航海图来自于16世纪末、17世纪中叶英国一位著名的律师约翰·雪尔登(John Selden, 1584-1654)的私人收藏,正因为如此,西方学术界和图书馆学界现在一般将之称为《雪尔登地图》(The Selden Map)。1654年,雪尔登去世后,他的大部分私人收藏品于1659年捐献给了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在鲍德林图书馆接收的雪尔登私人收藏品中,除了这幅中国明朝中叶的航海地图外,还包括一大批用东方语言书写的手稿、古希腊的大理石雕刻、一只中国罗盘,以及一部描述墨西哥印第安部族阿兹特克人(Aztec)历史的名著《孟多萨法典》(Codex Mendoza)。英国的学者们认为,这幅地图很有可能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驻万丹(Banten)商馆人员从前来市易的福建商人手中购取的。

万丹,我国明代中后期载籍称之为“下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端,16世纪初从爪哇岛Demak逃出的一批穆斯林教徒在此聚居成村。在Hasanuddin及其子Molana Yusuf统治时期,万丹逐渐地崛起,并在1570年左右成为东南亚群岛地区的重要商埠。时值明隆庆年间(1566-1572),明穆宗于隆庆元年(1567)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解除海禁,准许福建漳、泉之民商贩东、西二洋。于是,每年有大批福建闽南海商向官府申请船引前往包括万丹在内的东南亚各商埠贸易。降至1600年,万丹已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胡椒生产及销售的商品集散地,当地常年聚居着大批来自欧洲、西亚、华南、马来半岛和香料群岛的商贾,其中以福建海商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最为活跃,双方经常携手合作经营胡椒收购和出口生意。^[1]1998年夏天,笔者曾从香港前往早已废弃的万丹古港实

[1] Edmund Scott, *An exact discourse of the subtilties, fashions [sic], pollicies, religion, and ceremonies of the East Indians, as well Chyneses as Javans, there abiding and dwelling together with those people, as well by us English as by the Hollanders, as also what hath happened to the English Nation at Bantam in the East Indies since the 2 of February 1602 untill the 6 of October 1605*. See Sir William Foster ed., *The Voyage of Sir Henry Middleton to the Moluccas, 1604-1606*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43); G. P. Rouffaer and J. W. Yzerman (eds.), *De eerste Schipvaart der Nederlanders naar Oost-Indië onder Cornelis de Houtman 1595-97. Journaal, documenten en ander bescheiden* (The First Voyage of the Dutch to the East Indies under Cornelis de Houtman, 1595-97. Journals, Documents and Other Papers), Deel I, W. H. van der Meer ed., (Copenhagen, 1915); William Foster ed., *The Journal of John Jourdain 1608-1617* (Cambridge, The Hakluyt Society, 1905).

地考察，并雇用了一名能说印尼巽他语的爪哇人当向导。在当地村民的引导下，笔者在荒芜的一人多高的茅草丛中见到了一大片 17 世纪初至 18 世纪初的墓地，其中有不少是福建漳泉商人、土著穆斯林和葡萄牙人的坟茔，附近散布着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留下的古堡残垣。考虑到这些史实，拙以为，英国学者对此航海图来源的推测和解读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可以接受。

二、航海图简介

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收藏的这幅明代中叶航海地图与以往所见的古航海图不太一样，颇有特色。首先，这是一幅完整的航海地图，而且相当大，大约长 1.5 米，宽 1 米。该图绘制的地域北起西伯利亚，南至今印尼爪哇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东达北部的日本列岛和南部的菲律宾群岛，西抵缅甸和南印度。

其次，这幅航海地图是手工彩绘的，而且绘制得相当精细，就绘图技巧和地理方位的准确性而言，远在明代绘制的其他航海图之上。这幅地图的绘制者不仅细心地大致勾勒出了明王朝的疆界，还以绿色的粗线条在米黄色的底色上画出明朝各行政区之间的边界。依照明代地图绘制时的惯例，绘图者在明朝各省、府、州、县的名称上画圈标识，惟各省或重要的城镇名称以红线粗笔画大圈，下属州、县名称则冠以褐色小圈。此规则不仅应用于绘制明朝版图，在绘制东亚和东南亚的各商埠、古国时亦同样采用。略有不同者，明《武备志》卷 240 所附之《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即《郑和航海图》）、《筹海图编》所附多幅中国沿海地图等明代手绘地图均以方框来标识相关地名，而此图则代之以圆圈。

再者，地图的绘制者在地图的上方正中画上了一道比例尺，以及一幅中国民间传统的航海罗盘方位图，准确无误地标识出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之八个方位。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史上，地图绘制者本身具有如此鲜明、强烈的方向感和距离感，并将标尺和航海罗盘绘制在图上，殆为首例。

此外，就绘图技巧和特色而言，绘图者以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白描技法在地图上勾勒出了重叠的山峦、树林、宝塔和楼阁，然后施以淡彩，或以红、黄等色加以点缀，用以表示不同地区的地貌。最为有趣者，绘图者在中国明朝版图内画的树木和在东南亚热带地区画的树木是不同的。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之后，人们可以看到绘图者在马来半岛上绘制了一颗巨大的棕榈树和一些热带雨林，这说明当时这幅地图的绘制者已相当了解东南亚的风物和特产情况。

为了重点说明该图的某些部分，同时为在大洋中操纵帆船的舵手提供具体的航海针路指引，绘图者在图上做了一些文字说明，并加以方框予以强调。例如：“昆仑山，一名雪山”。又如：“古里往阿丹国，去西北，计用一百八十五更；古里往法儿国，去西北，计用一百□□（此处脱落二字，难以辨识）更；古里往忽鲁谟斯，用乾针五更，用乾亥四十五更，用戌一百更，用辛戌一十五更，用子癸二十更，用辛酉五更，用亥十更，用乾亥

三十，用单子五更”。换言之，这幅明代中期的航海图相当准确地标识出了中国帆船从南印度西海岸古里（Calicut 今印度 Kerala 邦）启碇前往位于波斯湾口之忽鲁谟斯（Hormuz）的航行针路。笔者用向达先生早年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抄录回来并刊布的《顺风相送》海道针经中的有关航路记载加以核对，发现二者如出一辙，惟此航海图的文字说明更为简略而已。考虑到这是一幅航海图，不是一本民间流传的航海针路簿，绘图者不可能在地图上有限的空间内以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上详细的航海针路说明，如此简要的说明情有可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中期的这幅彩绘航海图显然是一幅庞大的挂在墙上或铺陈在大桌子上使用的航海地图，而不是像明初《郑和航海图》或已故复旦大学历史系章巽先生从旧书摊上收购、然后注释出版的《古航海图考释》（北京海洋出版社，1980年版）那样，由多幅简单勾勒出的山形水势图连接起来的一幅呈长条形状的海图。这幅地图的绘制者没有沿袭历史上绘制航海图的传统方法，根据中国帆船行驶的针路来绘制航路，在简陋的草图上标识出航路附近的岛屿、城寨、港埠、王国等，而是在一幅绘制精细的彩色地图上，以黑线准确地画出从福建沿海延伸而出的东、西洋航路。这样，使用者便可一目了然地看到中国在亚洲海洋世界中的位置，进而了解明朝中叶中国帆船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经营海外贸易的活动范围及主要航线。与此同时，或许是为了强调福建海商活动的区域，也可能因为绘图者对于中国北方地理情况的不熟悉，这幅地图的绘制者有意识地将中国明朝疆域的华北、华中部分变形、压缩，而将整幅地图描绘的重点放在了华南，以及海外的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印尼群岛、南亚次大陆等福建商船贸易活动的海域。也就是说，正因为这是一幅反映明朝中叶福建海上贸易活动的航海图，而非一幅普通的明朝地图，绘图者希望让图中的中国帆船泛舟之东西洋航路成为焦点，所以，这幅地图的中心及描绘细节被置于华南沿海、东亚及东南亚诸贸易港埠和岛屿。

三、航海图上绘制的东西洋航路

这幅明朝中叶的航海图上共绘制了中国帆船经常使用的6条东洋航路和12条西洋航路，详情如下：

东洋航路

- 1) 漳泉往琉球航路
- 2) 漳泉往长崎航路
- 3) 漳泉往吕宋航路
- 4) 潮州往吕宋航路
- 5) 吕宋往苏禄航路
- 6) 吕宋往文莱航路

西洋航路

- 1) 漳泉经占城、柬埔寨往咬留吧航路
- 2) 漳泉经占城、柬埔寨往满喇咖航路
- 3) 漳泉经占城、柬埔寨往暹罗航路
- 4) 漳泉经占城、柬埔寨往大泥、吉兰丹航路
- 5) 漳泉经占城、柬埔寨往旧港及万丹航路
- 6) 满喇咖往池汶航路
- 7) 满喇咖往马神航路
- 8) 满喇咖沿马来半岛西岸北上缅甸南部航路
- 9) 万丹绕行苏门答腊岛南岸航路
- 10) 咬留吧经马六甲海峡往阿齐航路
- 11) 咬留吧往万丹航路
- 12) 阿齐出印度洋往印度傍伽喇、古里航路

由于尚未见到航海图的原件，仅根据电子版观察，所以此处归纳的东西洋航路或有遗漏。在上述这几条东西洋航路中，除了自福建沿海前往日本长崎、马尼拉、以及经由柬埔寨南部往印尼爪哇岛北岸咬留吧（巴达维亚）这三条航线是穿越大海直航之外，其余的航路基本上都是沿岸航行。之所以如此，固然因为沿岸航行便于中国商人随时停靠各大小贸易港埠与当地土著交易，同时应该也考虑到海途险恶、需不时就近躲避台风等安全方面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航海图上，无论是东洋航路，还是西洋航路，其自中国沿海出发的起点都是福建东南沿海的泉州港或漳州港，这充分说明了明朝中叶时执中国民间海外贸易之牛耳者非闽南商人莫属。由于地图上泉州和漳州二地画得很近，所以很难确认绘图者究竟想将东西洋航路的起点置于泉州还是放在漳州。但是，从福建沿海港埠的兴衰沿革历史来看，明朝中叶时期的泉州港早已经走向衰微，代之而起的是民间海外贸易兴盛之漳州海澄月港。所以，笔者以为，当时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商人川走海外的东西洋航路之起点应该是画在漳州。这一点，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中所记载的东西洋针路及其他相关史料可为佐证。不过，这不排除当时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商船是从泉州港启碇下海的，所以笔者在胪列东西洋航路时采用了“漳泉”这一名称。

四、航海图的作者与创作时期

既然这幅航海地图是以明朝中叶福建海商在海外的活动范围和主要港埠为基础而绘制的，反映的是以闽南漳泉地区为中心的中国民间海外贸易网络，那么，所有看到这幅航海地图的人很自然地便会推断出该图的绘制者应该就是闽南人。而且，该绘制者肯定经常接触经营海外贸易的民间商人，熟悉闽南商人在海外市易、寓居的情况，以及东南亚和日本等地的风土人情和物产。笔者甚至大胆推测，认为该海图的作者本人或许就是一位常年附随商船在海外各贸易港埠奔波经商的乡间秀才或民间画工，也可能是一位转而经商的早年

落第举子，因为一般的民间中小商贾没有什么文化，不太可能具有如此精湛的绘画技巧。无独有偶，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亦认为，这幅航海图应该是在福建泉州创作的。但是，这幅地图显示出许多不同于传统中国地图的绘图技巧和方法，而与中东阿拉伯人的地图绘制法相近。因此，英国学者判断，该图的作者或许是一位定居在泉州的早已汉化了了的阿拉伯人。笔者颇为赞同英国学术界同仁的推断。倘若英国学者的推断是真实的话，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地图绘制者要在这幅海图上将东西洋的起点画在较为靠近泉州的海面处。

当然，并不是所有西方的专家学者都接受这种推测。今年4月，笔者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参加一个有关亚洲历史的闭门学术会议上，遇到正在对该航海图进行研究的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卜正民教授是北美著名的明史专家，我们两人在会议休息期间对着手提电脑上的电子版古地图，不断地进行讨论，交换彼此的看法。卜正民教授不同意我提出的此图创作于漳泉地区的看法，坚持认为，这幅航海图的作者一定是当时定居在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福建商人。卜教授的理由是，这幅航海图和向达先生早年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抄录回国的两本航海针路簿一样，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既然那两本海道针经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从巴达维亚带回阿姆斯特丹，后又辗转流入英国牛津大学，那么，这幅航海地图也可能是经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而不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之手而流入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的。

至于这幅航海图的创作年代，综合上述的历史背景和地图上所绘制的东西洋航路来分析，笔者认为，应该是绘制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因为当时是福建民间海外贸易最为兴盛的时期，闽南商人的足迹遍布东亚和东南亚的各大贸易港埠，位于印尼爪哇岛西端的万丹恰好也是在此时一跃而为东南亚的贸易重镇。至于后来才开始逐渐兴起的巴达维亚港埠，荷兰人迟至1619年才刚刚将其占据，而处于草创时期的巴达维亚根本无法与当时东西方商贾辐辏之万丹竞争。

五、结 语

倘若上述推断无误，有关这幅航海地图的故事发展梗概大致是这样的。在17世纪初的某一年，经由航赴爪哇岛万丹贸易胡椒的福建闽南商人之手，这幅绘制于泉州的彩色航海图被驻守万丹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收购，然后被带回伦敦，之后又辗转在1654年之前被英国著名律师兼牛津大学第一位东方学家约翰·雪尔登私人收藏，并于1659年成为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的正式藏品。此后的350余年间，这幅地图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鲍德林图书馆的仓库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待美国学者Robert Bachebr和加拿大学者卜正民于2008年到访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而突然发现这不是一幅普通的中国古地图时，该图已因为年代久远而遭到严重损坏。幸好经过英国几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地图修复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这幅地图终于被成功地抢救修复，功德无量。现在，这幅明代中期的彩绘航海图已成为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该馆准备在今年9月为此专门在牛津大学召开一个小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据香港海事博物馆馆长Richard Wesley

博士最近函告，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正在与香港海事博物馆商谈，准备在 2012 年将此航海图的原件运到香港海事博物馆来展览，和公众见面。笔者以为，这并不是故事最好的结局，明朝航海图不应该走到香港就止步了。地处航海图故乡的福建泉州海交馆及中国政府有关当局应当尽快地和牛津大学进行协商，设法让这幅珍贵的明朝中叶航海图荣归故里与家乡父老见面，至少也应该请英国方面帮忙制作一幅精美的复制品，陈列在泉州海交馆内，以裨益学林，推动中国海外交通贸易史的研究。至于该地图的名称，尽管西方学术界现已按照惯例以捐赠者的名字来命名，称之为《雪尔登地图》，笔者却觉得十分不妥，建议中国学术界还地图的本来面目，让其落叶归根，改称《明中叶福建航海图》。

对于研究中国航海贸易史、明史、福建地方史及中国地理学史的学者来说，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地图在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的重见天日，不啻是学术界的一大喜事。随着该地图修复后的正式面世和刊印，相信会促使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问世。

作者钱江：香港大学教授

《一幅新近发现的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图》插图

